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
——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

顾 明 栋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扬州 225009)

摘　要: 20 世纪的人文社科是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受到西方语言哲学独领风骚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语言的领域存在着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认为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鸿沟,另一方面又套用西方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理论研究汉语和汉字。自中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学者对汉语汉字以及汉语汉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的比较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与观点,但这些观点和想法往往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从揭示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忽视汉语汉字的特殊性,并进而影响中国学者正确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拼音文字推导出来的西方语言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在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时不应照搬西方语言理论,而应多注意汉语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别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特点。

关键词: 语言哲学;汉语汉字;逻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普适性

中图分类号: H0 - 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3)06-0144-11

20 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是语言哲学的一统天下,海德格尔和维根斯坦这两位最有名的哲学家都对语言哲学情有独钟。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乃存在之家"不知被多少学者奉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金科玉律之一,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在 21 世纪仍然是影响深远。这种对语言的强烈关注可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探讨、古希腊认为逻格斯既是思想又是言语的观点,以及基督教圣经中广为人知的"太初有言"(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受到西方世界语言哲学独领风骚的深刻影响,研究中国语言的领域存在着一个悖论现象:一方面认为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鸿沟,另一方面又套用西方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哲学理论研究汉语和汉字,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研究范式,其源头可追溯至中世纪。自中世纪以来,众多西方学者对汉语及其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汉语汉字与西方语言文字的比较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与观点,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区别就逐渐被视为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分水岭。本文旨在揭示以形而上学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如何忽视汉语汉字的特殊性,并进而影响中国学者正确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本文指出:从拼音文字推导出来的西方语言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在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时不应照搬西方语言哲学理论,而应注意汉语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别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特点。

一、西方的形而上学与语音中心主义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一书中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两大类: 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①,并把汉语归为表意文字,他指

收稿日期: 2013-09-20

作者简介: 顾明栋,男,江苏射阳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暨南大学科研培育创新基金项目"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与转型"(项目批准号:12JNYH0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 26.

出:“在表意系统中每个书写符号都代表着一个词以及词所表达的意义。”①索绪尔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家,因为他知道他的专长所在以及应什么时候适可而止。由于意识到了两类语言存在着差别,他把自己的语言学研究限制在语音系统和西方字母语言范围之内。索绪尔承认两类语言存在共同点,例如书面语对大脑中口语的替代;同时他还认为汉字具有表意特征,这一特点使得汉语书面语对口语的替代更具有确定性。他含蓄地指出: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视觉性把它与语音系统文字区分开来②。这句话中涉及的汉字的性质问题在西方学者中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以费诺罗萨和庞德为代表的一派把汉字的视觉性夸大成颇受诟病的“图像本质说”③。与之相反,有些汉学家们则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及其表意的本质,认为汉语具有与字母语言同样的本质与功能。费诺罗萨和庞德认为汉字像一幅画,颇有点儿堂吉诃德式的荒诞不经。由于对汉语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经常歪曲汉字的真实面貌并作出错误的结论。为了驳斥上述错误的观点,有些汉学家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忽视了汉字那些区别于语音文字的特征。他们受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影响,也同样扭曲了汉字的本质。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的形而上学在探讨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时构建了一种等级制度:语言表达思想,文字记录语言,语言通过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得出口语在本质上高于书面语和文字,这就是备受雅克·德里达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因其认为在场比缺场重要,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一种形式。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的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此居于次要地位。尽管汉学家们可能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他们中间甚至不少人可能从没听说过或花力气去理解什么是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但他们在汉语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在强调语音至上的西方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许多汉学家们不仅否认汉字的视觉性和表意本质,还宣称汉语同样归属于语音文字系统,而这就显得太离谱了。杜·邦瑟(Du Ponceau)或许是第一个驳斥汉字表意本质的西方思想家,他的观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结果之上,这可从其结论里清楚看出:

> 我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系统被错误地说成是“表意的”(ideographic),其实是一个“音节的”(syllabic)和“词素的”字母表。它是“音节的”,因为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它又是“词素的”(lexigraphic),因为每个音节都是一个有意义的词。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名称能恰当地应用到中国文字之上。这个看法对我来说是十分充分的描述。④

在此段文字中,用西方概念描述中国文字的做法一目了然。正如西方语言使用诸如“syllable”,“lexigraph”和“alphabet”等,杜·邦瑟也就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汉字和书写,全然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性质和特征及其术语,如:文、字、词、书。中国第一个词典编纂家许慎(58—147)在《说文解字》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些术语的差异,揭示了与西方文字不同的独特之处:

>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

许慎的表述清楚地指出了中国文字的象形和表意性质。“字母表”是一个西方术语,指的是用来记录西方语言的一套标准性字母(即基本书写符号或字形)。其基本原理是每个字母代表口语的一个音(有意义的声音)。它与其他种种可能使用

① See Ernest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dited by Ezra Poun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68.
② 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p. 26.
③ See Ernest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dited by Ezra Pound.
④ Peter S. Du Ponceau,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In A Letter to John Vaughan, Esq*,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38, Kessinger Publishing's reprint, p. 36.
⑤ 许慎:《说文解字》第15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图形代表音节和词或者使用字符来代表音素和意群的书写系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文字中完全不可能找到与西方字母表哪怕是接近的概念。但这一事实丝毫不能阻止杜·邦瑟使用“字母表”描绘中国文字。如此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文字有成千上万个汉字,数量之多根本不可能构成西方概念意义的字母表。然而,杜·邦瑟的这个观点只是其使用西方语言理论分析中国文字的努力的一小步。

在其核心观点中,杜·邦瑟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 此问题类同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人们永远不能找出满意的答复,因为这取决于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原始人的肢体语言、符号和洞穴壁画视为早期的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西方著名哲学家和文字学家乔瓦尼 · 巴蒂斯塔 · 维柯(Giambattista Vico),倾毕生精力研究语言与文化,他赞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同时产生与发展。经过长期艰辛的研究,他提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言语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心理语言,斯特拉博认为心理语言先于任何口语形式而存在,这就是为何希腊的逻格斯既是一个词同时又传达一种思想……远古时期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①。因此,在其鸿篇巨制《新科学》一书中,维科提出语言和文字是同时产生的,并且断然否定了学者们其他不同的观点。他说道:“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向前发展。”②正如笔者后面要揭示的,在汉语与汉字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

杜·邦瑟好像没听说过维科的观点。他提出一个带有成见的问题,把汉字的表意性曲解为“语言是为了迎合文字而产生的”③,这种谬论是毫无根据的假设。上述问题与答案说明杜·邦瑟好像完全不认同汉字表意论。当代语言学家中,杜·邦索最有力的拥护者是卜弼德(Peter Boodburg)、德范克(John DeFancis)以及鲍则岳(William Boltz)。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④。尽管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Herrlee Creel)和陈汉生(Chad Hansen)坚持认为汉字具有表意性⑤,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其他人认为他们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晚至 1995 年,威廉 · 汉娜斯(William Hannas)仍明确表示:“我们否认文字是现实以及心理世界中实物与概念的标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同时我们还否认以下毫无根据的假设:汉字具有表意性,也就是说文字与意义无需语言的参与,直接相互联系。”⑥

二、语音中心论与表意论

杜 · 邦瑟的当代拥护者们对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关系作了详细、恰当的观察。然而他们在试图消除中西语言的隔阂时却忽视了汉语自身的特

---

① Vico, *New Science*, in Vincent Leitch et al, eds.,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 New York: Norton, 2010, p. 332.

② Vico, *New Science*, p. 320.

③ See Peter S. Du Ponceau's letter to Captain Basil Hall,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In A Letter to John Vaughan*, *Esq*,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38, Kessinger Publishing's reprint, Appendix A, p. 108.

④ Peter Boodberg, "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1937),p. 332.

⑤ See Creel,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T'oung Pao,32(1936)160; Chad Hansen, "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2 (1993): 375.

⑥ William Hannas, "The Cart and the Horse", Georgetown Univers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995), p. 1.

性。他们尝试用西方语言理论来分析汉语,形成了一种理论倾向,笔者称之为“语音中心论”。众所周知,语言符号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 S”:语音(sound)、形体(shape)与意义(sense)。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反对表意论的人只考虑到了其中两个因素。比如,鲍则岳强调说:“任何一个单词都包含两个方面:声音和意义。”①他很显然忽视了语言符号三要素中很重要的“形体”要素。这一疏忽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字母语言中,语言符号的形体并不像汉字形体那么重要。索绪尔曾说过只要一种符号可被辨别且不与其他符号相混淆就可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然而在汉字中,形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正是由于汉字形体的魅力才产生了书法艺术,也使得书面语要比口语更具优越性。“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系统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一个人可以在不知道如何读一个汉字的情况下辨认字形并知道它的大概意思。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许多中国人认识某些汉字也知道它们的意思,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读。在笔者看来,在构成汉字的三要素中,形和义是更重要的。形体是一个字之所以成字的基础,意义是字所代表的内容,而声音只是一种口语交流手段。形体和声音都是意义的体现者,前者是通过视觉手段,而后者则是通过听觉手段来发挥交流作用。80% 以上的汉字都是通过形—声结合而成的“形声字”,在形声字中,声旁几乎不表示任何意义。在表意方面形体要比声音更有效。因此视觉价值要比听觉价值更重要。

与汉语不同,字母语言更关注听觉价值,这根源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中对虚幻无形之物所体现的先验价值的重视。德里达将西方语言理论中重视声音的现象描述为“语音中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就是借助这一理论从“语音中心”的角度来开始研究汉语语言的。早期代表就是杜·邦瑟,他说:“很明显中国人发明汉字并不是用来代表汉字的形体,当然也不是用来代表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因为字义是从口头表达中抽象出来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②。鲍则岳也从语音中心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类似的描述:“任何种类的书面汉语都仅仅是口语的一种符号化表达。”③鲍则岳唯恐自己没有阐述清楚,又进一步声称:“另一方面,当我们说‘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观点’时,其实我们真正想表达的是‘文字的功能就是交流通过该语言的口语所传达的观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已将书写界定为其意义通过语言中介传达的可视性符号系统。”④在这里鲍则岳做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他用“语言”代替了“口语”,从而提出了一个语音中心主义的论断:“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书写定义为口语的符号化表达,将文字系统定义为:口语的系统化表达符号。”⑤鲍则岳料到会有人反驳他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承认:“像所有定义一样,这一定义只是一种个人判断。文字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传递或交流意义的任何可视性符号或标记,与其与语言的关系无关’”,然而他仍然推崇语音中心的定义,他说:“将书写定义为与语言有直接体现性关系的符号系统,其优势在于它很清楚地阐明了我们直觉上所感知的书写的本质或发展史,这一点其他定义并没有做得更好。”⑥这里他使用的“直觉”一词表明了以字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一种偏见:口语先于书面语。

鲍则岳强调语言的声音属性但却忽视了语言

①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 CT: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 p. 18.

② Du Ponceau's letter to Captain Basil Hall, *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Appendix A, p. 109.

③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4.

④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6.

⑤ William Boltz, *The Orig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7.

⑥ William Boltz, *The Orig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7.

的交流功能,同时也低估了中国思想家从远古时期就一直重视用语言来交流所产生的影响。这里笔者只引用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庄子的著名寓言"鱼筌与兔蹄"就支持直接交流的观点。这个寓言中常被引用的章句是"外物篇":

>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①

庄子的寓言给直接交流或无声交流提供了很好的诠释。这则寓言对中国语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后人关于语言表述的争论树立了模式。在庄子看来,筌和蹄是捕鱼和抓兔的工具,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也只是用来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语语言表述的语义导向。在魏晋时期,人们激烈地讨论语言表述的实质。王弼是其中之一,他强调符号和语言的语义表述。在他的著作《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在开篇就讨论了象(形象)、意(思想)和言(语言)间的关系:

>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这段话清楚地显示了中国语言理论和西方强调语音的字母语言理论是截然不同的。王弼在《明象》中借用庄子的寓言,进一步强调了汉语符号再现的语义导向:

>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②

庄子的寓言以及王弼和其他学者对其所做的进一步阐释都表明在汉语语言哲学中人们强调的是思想,观点和意义,而不是西方语言中强调的声音。反对文字表意论的学者忽视了由庄子和中国思想家所提出的意义导向传统,他们重口语而轻概念,犯了与庄子寓言中所讽刺的那些死盯着竹笼和兔网却忽视了鱼和兔的人一样的错误,买椟还珠,重视言语行为而忽视了所交流的观点。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将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主义套用到了汉语研究上。这一点鲍则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轻视语言的交流功能,强调其作为声音记录的功能:

> 通过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口语是用来传递意义的,文字是第二位的,它之所以有交流的功能,只是口语传达意义这一事实的一种自然结果而已。另外,文字系统中单个的符号能否交流意义取决于这个符号在哪个层面上体现这种语言。比如字母表中的字母并不携带意义,只是可发音而已,因为在大多数字母语言中,大部分的单个音素并没有相关联的意义。例如:英语中的 *n*, *e*, *g*, *l*. *s*, *h* 通常情况下只代表声音,独立出现时并不能传递意义。但是若从文字的角度来考察,它们也并不需要交流意义,只要能传递声音就可以。就像我们所说过的那样,文字中意义的传递完全是"文字体现口语"这一事实的一种功能。③

很显然,鲍则岳正像他推崇的前辈学者杜·邦瑟一样认为字母语言的语音特性对所有语言都是通用的。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汉语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字母,每个汉字代表声音的同时还表示意义。事实上,甚至连汉字的组成部分——部首,也可传达意义。鲍则岳引用英语字母的例子来支持他语音中心论的观点,然后他又将这一衍生观点用于反驳汉语中的"概念文字"观点:

> 正是这种对文字传递意义方式的误解导致了大部分人对汉字本质的困惑。因为大部分的汉字是在单字层级或至少是词素层级来体现口语的,而我们的字母则是在单个音素层级上体现,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但由于单字或词素是有意义的,因此汉字在表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与意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与西方字母系统的符号也是不一样的。然而这种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常比较随意的语言分析家和批评家们都置汉字与

---

① 《庄子》,郭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3 页。

② 王弼:《明象》,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卷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09 页。

③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p. 18 – 19.

> 声音间固有的本质联系于不顾而去强调汉字和意义之间的关联。①

他接着说道:“与意义的联系,也就是汉字的交流功能仅仅是汉字与声音相联系的结果,换句话说,汉字与语言的字词,或所谓‘口语’相联系,才会与意义产生联系”,通过这一论断,鲍则岳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语音中心论。他认为汉字能够表达意义理所当然是因为汉字通过声音与口语产生了关联。他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汉字从创立伊始就是用来表示意义而不是代表声音的。他以西方意指理论为框架,通过一种预设的逻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认为汉字肯定和西方语言的字母一样,用来记录声音,然后由声音来传递意义。这一点可从他进一步的论述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一个字符或一个字符系统之所以能称为书面语,其必不可少的特征是语音体现。也就是说,书面语必须体现口语。”②

鲍则岳的逻辑与汉语理论和实践是背道而驰的。从历史角度看,古汉语刚开始出现时可能并不是一门口头表述的语言。有两位当代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曾开玩笑地说:“古汉语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小男孩:它创立之初是用来看的而不是用来听的。”在他们之前,高本汉有过类似的描述:“汉语文献是用眼睛来看的,而不是像口语那样靠耳朵和舌头来实现的。它拥有独立的生命,是与口语平行并存的一种现象”③。安乐哲和罗思文接着又用非常严肃的口吻写道:“现在和过去的汉语口语都一样,必须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而古汉语创立之初就不是一门口语,它现在不需要,以前也不需要说出来才能被理解;因此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到目前为止可能一直都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媒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明显,汉语书面语就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口语的转述”④。在同一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学者直接反驳了鲍则岳的观点并指明了其所带来的后果:“‘古汉语本质上是口语的转写’这种观点不但模糊了我们对两者差异的认识,同时也阻断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⑤。庄子和王弼的语言理论从哲学角度为反驳鲍则岳的论断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其他备受尊崇的古汉语研究者那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反驳古汉语语音中心论的有力证据。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是最早系统研究古汉语语音的学者之一,他就强调在汉语言发展之初的象形和表意功能:“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文字发展第一阶段并不是记录声音,或分析单字各部分是如何发音的,而是一种表意的图形文字,一个符号代表着整个单字的意义而不是其发音。”⑥通过这种表述,高本汉隐约地表达了一种古汉语视觉上的优越性,这一点由费诺罗萨和庞德更直白地表述出来。在同一研究中,高本汉清晰地指明了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 因此,中国一方面拥有一种已存在了好几世纪的文字语言,它简短、明了,字与字界限清晰,读者仅仅通过这种表意的字形就可以理解它的意思。总体来讲,这种语言好像在人类出现时就形成了,一直流传至今。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口头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许多种不同的方言口语,它们与中国的文字语言相去甚远。⑦

简单地研究过迄今可识别的用最古老的汉语写成的甲骨文之后,安乐哲和罗思文重申了其他研究所证实的观点:“目前辨认出来的上千个甲骨汉字中有许多在结构上都是象形和表意的”,他们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最终形态和语音

---

①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8.

②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19.

③ Karlgren,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 41.

④ Roger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Philosophic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8, pp. 38 – 39.

⑤ Roger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Philosophic and Linguistic Background”, *The Analects of Confn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p. 36.

⑥ William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 9.

⑦ Karlgre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 1949, p. 57.

两方面的证据都支持我们认为,最早的文字形式拥有自己的交流功能,不需要借助口语。在这个发展阶段,许多信息都是通过视觉来交流的。”①

语言实践证明,语音中心论是不可能存在于汉语中的。汉语普通话有 21 个声母,38 个韵母,通过声韵结合只能产生稍多于 400 个的音节。就算加上汉语中的四个声调也不过总共不到 1300 个音节。用如此少的音节来代表世界上词汇量最大的语言之一的汉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同音异义词。很多情况下,没有具体的语境人们就无法确切知道一个字的意思。结果出现了很多有意或无意的双关语。但是一旦汉字被写出来,即便没有语境,意思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大量同音异义词的存在使得汉语的字和词不可能以字母语言的方式来指代声音,同时也排除了汉语被字母化的可能。用古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并不是当代人最早尝试的。事实上,很早之前人们就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并付诸实践了。宋朝时期的郑樵在接触到梵语之后就意识到汉字的繁琐和字母的简洁。几百年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使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语,并出版了第一本用古罗马化的汉语写成的书——《西志奇迹》。其他西方传教士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他们用罗马文来书写汉语,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对汉语产生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的书籍都是写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汉语和中国文化的②。明末清初,一位官方学者方以智(1611—1671)着手研究汉字书面语与西方字母语言的关系,自此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前赴后继,做出了很多努力。尽管方以智批判了汉语书写的笨重繁琐,也将其复杂性与西方语言书面语的简约方便做了鲜明对比,但他的对比性批判也正好显示出了汉语书面语非语音化或表意的特性:

> 汉字之所以让人感觉迷惑是由于存在很多通用字,有时可以互换,如果一个概念只从属于一个词,而每个词也只有单一的一个意思,就像在遥远的西方语言中,声音与概念一一对应,而单词与声音一一对应,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重复或重叠的麻烦了,这岂不是更加高级吗?③

又过了两个世纪,在 1892 年,中国文字改革先驱卢戆章制定了第一套潜在可行的汉语文字罗马化方案。在其著作《一目了然初阶》的序言中,卢戆章对比了中国的低识字率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高识字率,并将这种差距归根于文字体系的不同。为什么其他国家识字率高呢?他回答道:“以共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书简易故也。”那么,中国怎样提高识字率呢?他提出中国应该采用一种汉语的罗马拼音方式,因为:“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④其对比评价再次证明了现代以前汉语语言文字与语音是分离的,而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的产生也仅仅是近不足百年来出现的现象。

晚清以来,汉语的拼音化得到了中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政府的大力推广,其中颇为著名的人物代表有沈学(1871—1900)、王照(1895—1935)、鲁迅(1881—1936)、吴玉章、毛泽东等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⑤,由国家通过并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拼音文字。然而,从利玛

---

① Roger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Further Remarks o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 290.

② Victor Mair's brief introduction to “Advocates of Script Reform,” in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 2, pp. 302-303.

③ 方以智:《通雅》卷一,《方以智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6—97 页。英译文节选自 Wm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3.

④ 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前言”,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6 年版。英译文节选自 Wm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05.

⑤ 吴玉章:《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中国语文》第 41 期,第 8 页。

窦使用罗马化的汉语以帮助西方传教士传教到今天拼音的使用以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这近五百年汉语拼音化的努力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证明了西方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认知以及汉语文字体系是表意而非表音之特性。

三、语言学汉学主义

与西方字母语言的语音中心论相对,汉语强调形意间的相关性,或许可以称之为表意论。它们均传统悠久,对文字体系之声、形各有偏重。西方语音中心论起源于字母语言的语言学发展,又在语言实践的哲学概念化之中得以推广。相比之下,汉语表意论则起源于历史上汉语语言的表意功用,而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观念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两者的哲学基础是不尽相同的。

在西方形而上学中,语音中心论最早的源起可能要追溯到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区分离观念的提出。而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最早提出语音中心论这一概念的思想家。关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他主张言语优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亚里士多德这一评论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因为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语音中心的重视是根深蒂固的。在现代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无一不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早在 1933 年,著名语言学家布隆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便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②。乔治·特雷格(George Trager)将书写的文字体系定义为“任何标记或者图示的规约性系统……代表着这样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达”③。在与汉语语言直接相关的研究中,司礼义(Paul L. M. Serruys)将汉语真实书写文字中的图形归为“系统必要的构成”,“形成了语言的视觉表征”④。

雅克·德里达曾指出西方语音中心论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之后的形而上学,其强调现象与本质、先验观念与具体现实的分离性。依笔者之见,汉字以图形和语意为导向,这是由汉语语言的性质及中国历史上语言使用所决定的。语音中心论适用于描述西方字母语言,而用它来描述汉语语言却是不得当的。汉语语言的表意论不仅仅是由汉字特殊的图形感所决定的,在中国玄学思想中,浩瀚宇宙万物全息相关,先验观念存于世间万物,这种对人与宇宙之间关系的思考更是决定了汉语语言的这一特性。或许,我们可以说汉字重形象与语义之特性同中国超验性存在于内在性的形而上学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研究语言与诗学之间的关系时,确认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着两个相关的问题:“沃格林已经明确指出了结构语言学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且相互关联的难题,即对‘语言大一统假设’的修正与对‘同一语言内不同结构的相互依赖’的担忧。”⑤这一洞悉应该给予了我们对汉语语言与文字的性质更为深入的见解。他还指出:“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任何一个说话者来说,都存在一个统一的语言。但是,这一整体代码是由相互联结的子代码构成的系统,即每一种语言都共存着几种功能各异的形式。”我们应当会从研究汉语语言的结构语言学里得出深刻体会。汉语经过数千年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我体系,同时也具备着不断积累的特性。现在,汉语的发展被赋予了一个兼容的趋势,这一趋势可能会让汉语去包容一些新异特点。不管是将汉语定义为完全表音语言还是完全表意语言,都过于简单化。应该说,汉语既具表音又含表意因子,而后者更为优先。任何过分

① Aristotle, *Categories and De Interpretatione*, translated by J. L. Ackri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16A3.

② Bloomfield,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33, p. 283.

③ George Trager, “Writing and writing systems”, 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12 (1974): 377.

④ Paul L. M. Serruys, “Basic Problem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raphs of the Shang Oracular Inscriptions”, *BIHPAS*, LIII/3 (1982), p. 455.

⑤ 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 A.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p. 352.

地强调一个因子而忽略了另一个因子都会导致语言汉学主义。

据笔者观察,在关于汉语文字体系性质的争论中,双方极少对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加以考虑,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中国上古时代的记录以及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均为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平行分离性提供了佐证。上古时代尚未出现文字,人们最初使用结绳记事,后来又改用书契。《易经·系辞传》中提到:“上古结绳而治,而后人以书契易之。”①陶制器皿和甲骨上的刻画符号是汉语文字的最早形式。因此,有足够多的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表明汉字最初并非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而存在。汉字最开始是以刻画符号形式出现,而后逐渐演变成文字,并形成了书写系统。至于与口头语言有所关联,那可能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才出现。现代中国学者再次肯定了汉语书面语与口语的独立发展。国学大师梁漱溟曾说,“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②。著名思想家李泽厚进行了大量的考证研究以证明汉字并非口头语言的书面记录。他也指出:“汉语语言并未给予音以优先级而是更强调义……最初,汉字的功能便是支配、统率、范导语言,而非记录语言。”③最近,他又重申:“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结绳记事’,文字不是把语言写下来,而是记录事情。最初的文字,就是为了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历史)记下来的符号如结绳,慢慢才演变为文字,最后才和语言结合,它作为符号系统,中国文字始终不是语言的复写。”④这些观点与本文前面提到的维柯的中心论断不谋而合。

在分析了汉语语言争论双方的观点后,笔者发现尽管表意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观点相左,但是他们的定位却相同: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更多是出自于自己学术和美学目的,而非是对汉语语言本身的关心。庞德、费诺罗萨及其他表意说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哲学研究和发展艺术的新型式及创新型途径,以推进知识与艺术发展的进程。持反对观点的则专注于以西方理论检验汉语语言,强使表意的汉语同西方字母语言的表音理论协调一致,以否认汉语文字的独特性。双方均受先入之见及预想目的所导向,仅有少数学者摒弃了汉学主义的偏见,承认汉语文字与语言的独特性。

笔者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起汉语语言学者,中国哲学和思想的研究学者反而在接受汉语语言及文化的独特性上更为开通一些,不太倾向于把西方观念和方法强加在汉语资料上。显然,否认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完全忽视了汉语与语音文字体系之间的区别性差异,也极少关注到汉字的象形性仍然清晰可察,其以表意为主的性质在中国语言学界是毫无争议的。而反过来,肯定汉语文字是表意的派别则又夸大了汉语文字的象形性,把它的价值普适化,因而不切实际地忽视了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尽管取向不同,他们都按照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习惯来做学术,这种方式却是共通的。故而纵使他们研究的初衷是要提供科学客观的汉语语言知识,而他们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汉学主义的语言形式,扭曲了中国文字体系的真实状况。

笔者已分析了西方研究汉语汉字的种种问题,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群中也存在。自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理论首创汉语语法以来,中国学者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也形成了一个研究路径,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受到质疑。语言哲学与语言学虽为两个学科,但在研究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和语言表征方面却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文字。关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广为接受的定论:文字不是语言,只是语言的记录或复写。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

①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87 页。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北京: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2 页。
③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4 页。
④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李泽厚 2010 年谈话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1—82 页。

于中国文字呢? 至少到目前为止学者的共识是如此。中国的语言学家大都接受这一观点。王力先生就如此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但是,文字不是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假定的符号系统,文字不等于语言。” ① 有些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文字发展的独特性,但仍然接受汉字是语言的复写这一观点:“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也是凝固的语言……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国文字的起源,虽然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以后才形成的。”②这样的共识颇有商榷余地。李泽厚先生在谈到汉字与语言的关系时指出:“中国的文字不是语音的复写。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家,从马建忠到王力,都可能犯了错误。他们都用西方的格式来研究中国语言。” ③ 这样的质疑虽然需要大量考证研究的支撑,但目前至少可以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套用西方语言理论研究汉语汉字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中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特殊性。

结　语

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性质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深层的原因究竟何在? 解决问题的路径又在何方? 笔者在此以一个学术性趣闻为灵感作一推测。在研究文字在无意识中的作用时,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用一则趣闻阐释了他对索绪尔符号观念的重新构思。一对兄妹乘坐火车,他们面对面地坐在窗边。当火车到达一个火车站时,停靠的站台边正好有一个洗手间。透过火车车窗,男孩看到了女洗手间的标识,于是说:“我们在女洗手间”。但是女孩看到了男洗手间的标识,便反驳道:“白痴! 你没看见我们在男洗手间么?!” 拉康的本意旨在显示能指以非具象的方式渗透进所指,从而引起其在现实中的位置的问题,以说明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④ 但是,这则寓言般的趣闻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深奥的道理,不仅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在不同性别、种族和文化背景下理解他者的困难。正如雅克·拉康所言,“对这两个孩子而言,男女洗手间将是两个国度,他们的灵魂将张开各自的翅膀奋力飞向各自的国度。这两个国家要休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没有削减他方荣耀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对其自身的优势做出妥协”⑤。拉康的启示可能能够解释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论以及无法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答案的原因。从小在拼音文字国度里长大、母语为西方语言的人,即使成年后学习汉语,甚至达到汉语流利的程度,并能读懂古汉语从事古籍的研究,但仍然很少有人能凭直观本能领会汉语汉字的微妙之处,因而较难彻底体会象形表意对汉语汉字的意义。反之以笔者为例,自成年后学习英语至今已有数十年,虽然听说读写的能力并不输于母语习得者⑥,但是,仍然无法彻底领会以语音为中心的拼音文字的微妙之处,这一点在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快速阅读,笔者在看中国书时可以像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读者那样一目十行,几秒钟之内就能扫描一页文字而知道大意,但在读英文书时无法达到同样的效率。二是观看英语的脱口秀,笔者无法像英美人那样从头至尾一直被逗得开怀大笑。这里不仅有文化习得的问题,也有母语习得的问题,更有伴随文化习得和母语习得而来的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笔者在本文结尾要强调的是,一旦我们自觉地意识到了无意识的认识论问题,我们也许就已经找到了走出语言哲学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话语之争的正确方向,朝着彻底认识汉语汉字的性质的方向跨近了一大步。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郭建平译)

①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9、44 页。

② 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 页。

③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李泽厚 2010 年谈话录》,第 81 页。

④ Jacques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7, pp. 151 – 152.

⑤ Lacan, *Écrits: A Selection*, p. 152.

⑥ 笔者若干年前考美国研究生入学必考的 GRE,英语成绩是七百多分,而美国研究生的平均成绩是五百五十分。

Are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Characterized With Universality? ——An Unsettled Debat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About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Gu Mingd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Abstrac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re dominated by linguistic philosophy. Due to the deep influence of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there has existed a paradoxical phenomenon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has been viewed as a conceptual divide that separates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 philosophy based on phonocentrism have been used to study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Since the medieval times, many Western thinkers and scholars have posited a series of ideas and views about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relation to Western languages and their written forms, but with few exceptions, most of them are constructed on metaphysical phonocentrism and logocentrism. By revealing how Western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have overlooked the uniqueness and peculiari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how this has in turn affecte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ir efforts to understand Chinese language, we may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derived from alphabetic languages are not universal truths applicable to all languages. In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we should not mechanically apply the theori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but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historic development, which differ from those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their alphabetic forms.

Key words: linguistic philosophy,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racters, logocentrism, phonocentrism, universality

(责任编辑　　管　琴)